

大中在倫家羅

奇葩綻開烽煙中

羅家倫在中大

(本文插圖刊第八頁)

● 裴實（大陸作家）

學貫中西複雜人物

東南大學八十多年歷史裡，中央大學階段共廿一年（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其中羅家倫校長的任期跨十年頭（一九三一—一九四二年）約占一半。這十年，也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卻又發達鼎盛的十年。

羅家倫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六九），字志希，浙江紹興人，生於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症併發，逝於台北榮民醫院，終年七十二歲。羅家倫先生幼年隨父傅珍寓江西任所，一九一四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一九二〇年，東南大學董、上海工商鉅子穆藕初，贈北大獎學金名額五個，資助出國留學，羅家倫為五人之一（其餘四名是段錫朋、周炳琳、汪敬熙和康白情）。羅氏留學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研究歷史，後至倫敦、巴黎、柏林諸大學深造，一九二五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軍，曾任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教務處主任，代理教

育長等職，一九二八年清華大學改為國立，羅家倫首任校長，一九三一年八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

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一九四三年任新疆監察使

，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

會議代表，臺灣當局駐印度大使，一九五〇年在臺灣任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及國史館館長等職。

羅家倫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他既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又是國民黨上層的官僚謀士；既

是學貫中西的學者，又是個業績卓著的大學校長。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北京大學成立《新潮社》，羅家倫是發起人之一，參加該社的有傅斯年、俞平

伯、馮友蘭、段錫朋、孫伏園、何思源、顧頽剛

、朱自清、周作人等。五四運動前夕，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創辦《新潮》月刊，是繼《新青年》

之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第二種最有影響力的刊物，羅氏是刊名的倡議者，而且是該刊主要的編

輯和撰稿人之一。在五月四日示威遊行時，他走

在隊伍的前列，並被推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國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北伐軍興

成立中央黨務學校（後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培養國民黨黨政人員，為蔣所賞識。

先長清華後長中大

一九二八年發生了「五·三」濟南慘案，交涉公署蔡公時等人被日軍挖眼割耳慘殺，並出兵包圍濟南，以圖阻撓北伐。羅家倫時任戰地政務

委員會教育處長，被慘殺的蔡公時為外交處長。那時蔣介石兵駐黨家莊，羅家倫和熊式輝奉派深

入險地調查並與日軍師團長福田彥助交涉，其膽識頗受國民黨內上層人物的讚譽。三個月後，一九二八年八月即被派為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

時年三十一歲。

羅家倫的國學根底很好，下筆千言，在復旦公學時，就被同學戲稱為「老夫子」。在北大文科畢業後，又去歐美各國研究歷史與哲學，可謂是學貫中西。當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陳寅恪先生評價羅家倫時說：「志希在清華，把清華正式的成為一座國立大學（按：他在清華任校長時，把中美庚款的清華基金從外交部的一些官僚的支配下爭取過來，使清華成為一所名副其實

中實的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像志希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說「後無來者」未免夸獎過分，然而，陳寅恪先生自有他的解釋，他說：「清華屬於外交部時，歷任校長都是外交部所指派的，對中國的學問大都是外行，甚至連國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說整個中國學問的認識了。像志希這樣對中外學術都知道途徑的人，在清華的校長中，實在沒有過！恐怕以後也不會有了。」但是，羅志希盡管學貫中西，畢其一生竟沒有甚麼足可稱道的學術成就。他自己就說過：「我們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犧牲了自己做學問的機會，來為大家準備下一個環境做學問。這也可以說是大學校長的悲哀！」

「這一番感慨深得大學校長們的共鳴。不過，有一件事倒也可以見出羅志希在學術思想上的卓識。一九三九年教育部就曾提出過一個漢字簡化方案，中政會（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時未予通過，會上只有兩個人是完全支持這個方案的，一個是吳稚暉，一個就是羅家倫。就因為他一向對簡體字的研究有興趣，在五十年代，臺灣中國語文學會開會，羅家倫也出席了會議，在胡適演講之後，有人提出簡體字問題，有幾位教授，因爲共產黨在推行簡體字而當面對羅家倫破口大罵。這倒也表現了羅家倫在學術上並不因政見之不同而能堅持獨立見解的學者精神。

他在中央大學校長的任期内，學校的進步學生是反對他的，因爲他積極推行軍訓制度，訓導制度，貫輸三民主義黨化教育，壓制學生的抗日愛國行動，使中大的進步學生運動在較長時期內

外雜誌說：「後無來者」未免夸獎過分，然而，陳寅恪先生自有他的解釋，他說：「清華屬於外交部時，歷任校長都是外交部所指派的，對中國的學問大都是外行，甚至連國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說整個中國學問的認識了。像志希這樣對中外學術都知道途徑的人，在清華的校長中，實在沒有過！恐怕以後也不會有了。」但是，羅志希盡管學貫

受到了壓抑。但是，就在國民黨內部，對他也是褒貶不一。蔣介石就曾問過：「羅志希很好。爲什麼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這是什麼原因？」

王世杰回答說：「據我所知，羅志希做大學校長時，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合，他不管是什麼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這也是羅家倫後來在國民黨內的派系傾軋中，黯然離開教育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中國有抱負、有作爲的知識分子，其結局總是免不了抹上一筆或濃或淡的悲劇色彩。但是，歷史事實終究是歷史事實。不以人之好惡爲轉移。談到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就不能無視羅家倫作爲首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特別是十年中大校長時期內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下面就舉羅家倫在中大校長任期内，他那雄心勃勃的抱負、有膽有識的決策和他自稱爲一個玫瑰色的甜夢等三事，作一簡略的介紹。

一九三二年八月，羅家倫被任命爲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時年三十五歲。其時中央大學正處於動亂之中，一度被國民政府行政院勒令解散整頓。先是易名風潮，十個月之內，四易校名，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東南大學易名第四中山大學，一

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復易名江蘇大學，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又改名國立中央大學。（後來在六十年代，所謂臺灣經濟起飛時期，任臺灣經濟部長和財政部長的李國鼎先生，在回憶母校的文章

中，曾戲稱自己是「四朝元老」，因爲他是「一九二六年考入東南大學，經中山大學、江蘇大學而畢業於中央大學的。」繼而是易長風潮，兩年不繼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略我國東三省，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中，鎮壓和破壞學生運動的朱家驥於當年十二月被迫辭職，國民政府又要委派任鴻雋爲中大校長，但他始終未到職，由法學院院長劉光華代理，主持校務。不久劉堅辭代理職務，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派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代理中大校長職務，次日（二十九日）段即到校就職，當時，學生正在體育館開會，段剛走進南高院辦公室，即被學生發現，一頓毆辱，從西門逃出中大，只當了一天代理校長。行政院遂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員會，蔡元培爲委員長，李四光爲副委員長，代行校長職務，竺可楨爲教務長，錢天鵠爲總務長，羅家倫是整理委員之一，不到兩個月，整理委員會解散，任命羅家倫爲中大校長。（這種易名，易長風潮，是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種怪現象，在許多大學都發生過，實是舊中國社會制度下、官僚、政客、學者、專家之間交叉滲透、錯綜複雜的矛盾的產物，不屬本文範圍，暫不詳加論述。）

羅家倫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就任中央大學校長的，上任之初，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他就在全校大會上，作了《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說，暢述他到中大來的抱負。他認爲中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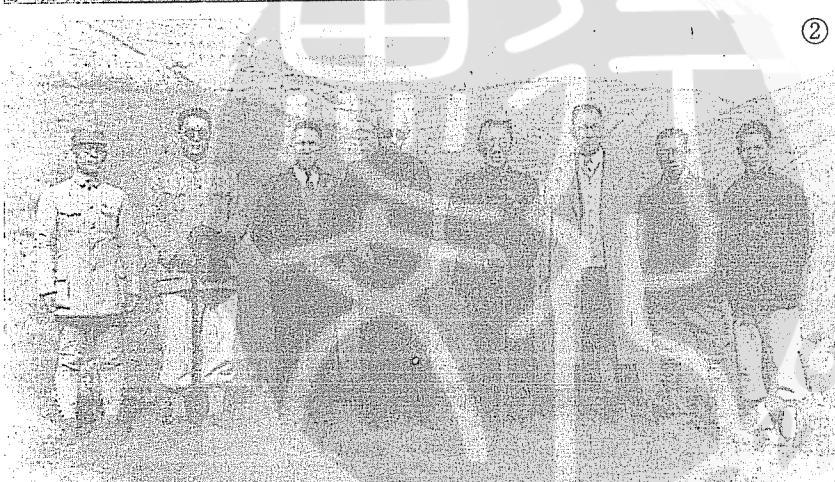
①羅家倫（左）民國三十六年與印督蒙巴頓夫人（中）、約翰生夫人（右）合影。

②羅家倫（右四）民國三十二年在甘肅與谷正倫（左四）、沈怡（左三）合影。

③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遊行，有○者為羅家倫。



①



②



③

國難嚴重到如此，中華民族已臨到生死關頭，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他認為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

他說：所以今日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社會的腐敗，而最要者卻在於沒有一種足以振起整個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他曾在德國的柏林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和英國倫敦的牛津劍橋大學城從事過研究工作，他心目中認為這些大學都是其民族精神的體現，他說：「柏林大學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靈魂。」他就想把地處首都的中央大學，承擔起這樣的使命。當然，他所說的「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由於對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日益擴張的國際環境缺乏具體分析，而不免流於空泛。但是，他那種勵精圖治，要把中央大學辦成柏林、巴黎、牛津劍橋那樣世界一流大學的雄心勃勃的抱負，確實也是真誠的，無可厚非的。

他指出：要負起上面所說的使命。必定先要養成新的學風，於是他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個字的新學風。「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以它為取得文憑資格的工具；「樸」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不以學問做門面，作裝飾，尚纖巧，重浮華；「雄」是大雄無畏的雄，以糾正中國民族自宋朝南渡以來的柔弱萎靡之風；「偉」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從整個民族文化的命運著眼，不可有偏狹纖巧，存門戶之見，故步自封。這些話，不僅切中當時學界之時弊，即到今日讀來也不無教益。當時在中央大

學物理系任教的戴運軌教授，（原子物理學家，後來在臺灣任中大前身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及臺灣中大校長）在回憶母校的文章中說到「誠、樸」二字是中大相沿成習，蔚然大觀的校風。他認為：「惟其樸實無華，方能刻苦用功。」

羅家倫校長當時宣布他的治校方針，分為「安定、充實、發展」三個時期。他也說：「我是學歷史的，知道時期是不可以嚴格劃分的，在一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當亟謀發展。就是到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實際上這三者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至今也是難以斷然劃分中大在什麼時候算是什麼時期，但是他認為這三個目標，努力做去。確實使中大在國難深重之際，仍然能臻於鼎盛。

聘人，是大學校長治校的首要之舉，國內著名大學校長都十分重視聘請好教授以推動學校的

學科發展和教學、科研進步。北大的蔡元培、浙大的竺可楨、南開的張伯苓等無不如是。羅家倫亦是如此，他曾說：「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確實難能可貴。即使在今日的條件下，也往往是很難處理的事。他聘人注重於學校的指導方針有三條：①厲行節約，縮減行政費；

②力持廉潔，養成廉儉風氣；③增加效能，少用人工多做事。在最初四年左右的時間裡，圖書儀器設備的投資達一二三萬元，為全部預算的四分之一強（按：年度教育經費約為一七二萬元）。其多的有一、三四年，為研究計，均不惜巨資，全部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後在美國

獲美國商務部主管審核單位無條件通過，羅家倫就電請他回國，到中大創辦自動工程研究班（後改為機械特別研究班）並逐步發展成中國第一個航空工程系。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十餘位著名教授，如留美的數學博士孫宗彭，地理博士胡煥庸和王益岸以及前清華教授胡坤遠和曾遠榮，化學博士莊恭生物博士孫宗彭，

留日的物理博士羅宗洛，留法的物理博士施士元

入中大的，如經濟學家馬寅初、藝術大師徐悲鴻

、詩人、哲學家宗白華、醫學界的蔡翹以及工科

的楊廷寶、劉敦楨、童雋、陳章、吳大榕、程式

等等，不勝一一列舉，從抗日戰爭前，經八年抗戰，各界名流學者、雲集中大，使中大在國內高

等教育界的聲譽蒸蒸日上。

羅家倫校長很重視學校的事務行政工作，他的指導方針有三條：①厲行節約，縮減行政費；②力持廉潔，養成廉儉風氣；③增加效能，少用人工多做事。在最初四年左右的時間裡，圖書儀器設備的投資達一二三萬元，為全部預算的四分之一強（按：年度教育經費約為一七二萬元）。其多的有一、三四年，為研究計，均不惜巨資，全部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後在美國

購齊。

在學科發展上，自中大整理委員會決定把地處上海的商醫兩學院劃出獨立後，終於一九三五年中大又再度創辦了醫學院，終於使中央大學成

爲當時學科最廣泛的規模最大的綜合大學，擁有一文理法師農工醫七個學院四十餘系科。在橫的方面中央大學學科之多爲全國之冠。在縱的方面，則從幼兒園，附小，附中到大學本、專科和研究院都齊備，這些都同羅家倫創校所奠定的基礎分不開的。就這樣。羅家倫的一腔雄心勃勃的抱負還不能說是充分實現了，在他的心目中還有一個更爲宏大的計劃在進行，這個計劃，後來被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炸彈炸得粉碎，這就是他自己所稱的「一個玫瑰色的甜夢」。

編織宏麗建校遠景

一九三四年，羅家倫覺得中大應該更爲飛躍發展的時機到了，他認爲現在的四牌樓校址，逼處都市中心無從發展，如工學院的工廠、農學院的農場等；車馬喧囂，市氣逼人，不宜於研討學問，培養身心，以養成高尚純樸學風；農學院與校本部分在兩處（農學院在三牌樓），教學設備均不經濟；師生住宿不易解決，不能使教授學生常相接近，收問難質疑之效果。於是他打定主意，要在市郊，既不在偏僻的山林，卻又離城市較近的地方，建造一個能容納五千至一萬學生的首都大學，他的打算，得到了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王政院一九三四年度按月撥付遷校建築費八萬元。

羅家倫派人在南京四郊尋訪新校址。花了幾個月功夫，選定了中華門外約七公里處的石子崗一帶地方，那裡氣象非常宏大，而且山林起伏，布置

起來可以曲折有致，離秦淮河上游不遠，有一支流經過，將來校內可有春碧的秦淮，豈止增加校景，還有工程和農業上的用處。此外，北面是巍巍鍾山，南面是樹木葱蘢的牛首山，東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見滔滔長江。他對於這一片新校址，充滿著美好的想望。在南京淪陷後，到重慶還做了一首新詩《憶南京》其中有一節寫道：

我又想到雨花臺南

崗名石子

橋喚鐵心

南望牛首

東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頭放眼呵

大江雄渾

秦淮澄清

這一水三山之間

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他還特地請了一位曾經爲蘇聯五年計劃設計學校建築的德國工程師來南京看過，也認爲地點甚宜。於是經內政部核定，圈地八千畝。他親自提出了中大新校址的各項建築要求。打算除醫學院及其規模較大的附屬醫院仍在四牌樓外（因醫院應在城市的中心）其餘各部份都在新校址。他懸賞五千元，請全國的工程師競爭設計圖案，經公開評定後，請興業建築公司繪圖承建。一九三七年五月，已投標開工的有工學院本院、航空工程系的教室、實驗室、農學院本院三大幢房屋，正在動手設計的是理學院、圖書館與宏大的運動

場，預計三十個月完成。完成之後，站在小山頂上一望，於美麗而含蓄的校景之中，一面工廠的馬達齊轉，一面機械化農場的火犁出動，圖書館裡人頭鑽動，運動場上幾十百的男女學生活潑潑地跳躍，悠揚的歌聲，相和相答，這怎能不教人心曠神怡？羅家倫幾乎陶醉在他的這個美好的夢想之中了！新校址五月動工，六月，日軍就在宛平進行大規模的挑釁性的軍事演習，七月，蘆溝橋的炮聲響了，八月，日軍進攻上海，十二月，南京淪陷。這個美麗的仲夏夜之夢，中大城的宏麗圖景。被日寇的鐵蹄魔爪，踐踏撕裂得粉碎了。

抗日軍興美夢破碎

按說羅家倫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非毫無警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全國掀起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後的一二、九運動，都震撼著他的心靈。但是他一方面面對蔣介石抱著幻想，另一方面又天天面對著呼號抗日救亡的熱血青年，其内心是極其痛苦的。他說：那個時候，他只有做做重歌「以略抒胸中的抑鬱」。一九三三年他做了三首軍歌，在《申報》登載，其中唱道：「男兒報國意氣豪，橫刀躍馬夜渡遼」（軍歌一）「國仇未報恨難消，滿腔悲憤捕群狼」（軍歌二）「男兒生不勇殺敵，死也算不得英豪」（軍歌三）在這種抑鬱、悲憤和堅強的意志，以及對蔣介石政府的幻想之外，

還能有什麼解釋呢？羅家倫不可能想像得到，就在他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逝世的前一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南京長江大橋全面通車了，又二十年型的綜合大學——東南大學，這次不是在南京的南郊，而是在南京的北郊浦口，正在建設起浦口科學工業園和東大分校新校址。這裡南臨巍巍長江大橋，東北是現代化的工業區，西面是美麗富饒的老山林區，較之南部更富於現代化的色彩，參觀過的中大、東大校友無不為此而感到振奮。

羅家倫先生地下有靈，亦當含笑瞑目了。

羅家倫在一九四二年離開中大時的告別演說中，談到他的這個玫瑰色的甜夢時，還不無幽默和聊以自慰地說過：「造化的安排，真是富於諷刺性。我在南京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新校址，但這點領到局部而未用完的餘款，竟使我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在重慶沙坪壩和柏溪兩處，造成兩個小規模的新校舍，使數千青年，沒有耽誤學業，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說到的羅家倫校長在中大的第三事：一項有膽有識的決策。

西遷決策有膽有識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北方的大學，如北大、清華、南開等校遷至長沙，成立臨時大學聯合大學。南方的大學如同濟大學，在八·一三之後，先遷浙江金華，繼遷雲南，後又遷至四川

南開；浙江大學則是先遷建德，復經江西、湖南、廣西，最後才在遵義立下腳根，各大學輾轉遷

有相當地皮可借，應迅速開工，以備應用」等等。

西遷重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就在重慶開學復課，八年抗戰中教學從未間斷，損失最小，秩序最為穩定，在高校中可謂是絕無僅有的奇跡。

他一方面通知總務處在冀東事件時就預留下的五百只大木箱，釘上鐵皮，以備長途遷校之用，同時，他即派出三路人馬，尋訪遷校新址。一路是法學院院長馬洗繁先生和經濟系主任吳幹先生向重慶出發，二路是心理系教授王書林先生向兩湖出發。後來另一路是醫學院教授蔡翹先生向成都出發，專為向華西大學接洽容納中大醫學院事，接到各路調查報告後，羅家倫乃決策西遷重慶。當時各方面議論紛紛，阻力甚多。有主張就在南京城外挖防空壕上課的，有主張遷上海的，有主張遷安徽九華山的，有主張遷牯嶺的，有主張遷武昌珞珈山、沙市和遷宜昌等等。但是羅家倫力排衆議，決定一舉西遷重慶。他認為：一、這次抗戰是長期的，文化機關不比軍事機關，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遷地點，以水道能直達者為宜，搬過小家的人應當知道搬這樣大家的困難，第三、重慶不但在軍事上極為險要，而且山川起伏，宜於防空。羅家倫的決策在上層爭取到了蔣介石的支持，在四川得到了劉湘的同意，劉湘在

一九三七年十月致中大的覆函中說：「查貴校為首都最高學府，茲因避地來渝建築臨時校舍，於川省文化裨益實多，無任歡迎，重慶大學既

作出這樣一個決策不容易，而實行這個決策更不容易，何況是在敵機的轟炸中，幾千個人、幾千箱圖書儀器設備，千里長途西遷。有些事，是我們四牌樓的東大人應該知道，永遠不能忘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敵機第一次轟炸南京，一批敵機向中大掃射，彈中圖書館和附屬實驗室大門（今南師附小）第二次是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時許，敵機轟炸中大，落彈七枚，炸死校工七人，損毀房屋七八處。大禮堂被炸，講台上笨重的椅子被炸得飛上三樓看台安然放著。羅家倫的辦公室（在大禮堂）被炸得不像樣子，他就站在校門內梧桐樹下辦公，見到每一位教職員進校，就分配他一件整理和裝箱方面的工作，如他見到航空系的羅榮安教授，就請他務必將航空系的風洞裝箱運走，羅榮安先生完成了這一工作方離開。在轟炸中也有一些巧事。牙醫專科學校被炸平了，剛巧就在這天早晨八時已將二十八箱貴重儀器運到了下關裝船。女生宿舍的全體女生剛在這天下午四時半搬到了三牌樓農學院，二小時後三樓二樓搬下底層，一輛裝運高射炮彈的汽車在門外路上被彈片擊中，起火爆炸，三樓二樓的門全部擊碎，在一樓的學生卻安然無恙。說這是巧事，只是時間上的巧合，其實羅家倫在八·一五學校第一次被轟炸掃射之後，他就考慮到男女學生的安全，親自寫了一個條子，讓女生搬到農學院。男生集中搬到樓下，但是男生貪圖樓上風涼

女生以住在校內方便安全均不肯搬遷，拖拖拉，在羅校長命令一再督促之下，才於十九日搬完，這不是什麼巧事，恰恰表現了羅家倫校長的高度責任心和冷靜堅定的精神。事後有四位女生來向羅校長道謝，羅笑著對她們說：「你們當時還不肯搬呢。」八月二十六日敵機再度轟炸中大，把實驗學校炸了，羅校長到實驗學校，站在彈坑邊，對幾位教職員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以後就將實校遷到安徽屯溪開學，後又遷至長沙岳麓山、貴陽等地，始終不肯因大學經費困難而停辦實校，就是要爭這一口氣。這次成功的千里西遷，最基本的是全校師生貢工具備同仇敵愾的精神，同時也充分表現了羅家倫校長卓越的組織才能。這時，在物資遷運大致就緒的情況下，他一方面通知全體師生於十月十日集中漢口轉船西上，一方面請事務主任李聲軒和水利系主任原素秋、工程師徐敬值前往重慶辦理校舍建築事宜，他本人則於十月十日趕到屯溪主持了實驗學校的開學典禮，事後即赴漢口，二十五日抵渝。在各位教職員工的努力下，重慶的新校舍，分十八戶包工，一千七百多工人，日夜趕工，以四十二天的時間，完成了能容一千餘人的校舍，到十一月初就開始上課。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則已先期在成都開學，這一場千里西遷的壯舉，終於勝利完成。

沙坪中央最高學府

在國難聲中西遷入川的中央大學不但沒有停辦，反而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南京的最後一年

學生人數不過一〇七三人，二年後在重慶包括大學和研究院則達到三一五三人，外加實驗學校六五一人，技工訓練班五十人共計三八五四人，較南京時約增加了三倍。這時的中大，分為四處（一）沙坪壩本部；（二）柏溪分校；（三）成都醫學院；（四）貴陽實驗學校。大學部分，將教育學院調整為師範學院，下設：國文系、英語系、教育學系、公民教育系、數學系、理化系、博物系、史地系、藝術系、體育系、童子軍專修科共十系一科，較前增添了七系一科；工學院有土木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建築工程系、航空工程專修班、附屬技工訓練班及各工廠，電機系土木系從單班加到雙班，機械系從單班加到三班；文學院分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系、歷史學系、哲學系；理學院分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地質學系、心理學系；法學院分法律學系、政治理學系、經濟學系；農學院分農藝系、園藝系、農業化學系、森林學系、畜牧獸醫專修科，附屬農場三、牧場一；醫學院分前期和後期兩大段落，醫前期分生理學科、人體解剖科、病理學科、組織學科、藥理學科、神經學科、生物化學科；醫後期分內科、外科、牙科、耳鼻喉科、婦產科、骨科、放射科、公共衛生科、附屬醫院。研究院法科研究所設政治經濟部，理科研究所設數學部、物理學部、化學部；工科研究所設土木工程部（包括水利）、電機工程部、機械工程部（包括航空）；農科研究所設農藝部；師範科研究所設教育心理部等，共計七個學院、一個研究院，五十

六系科、九個研究部。至此，中央大學的學科設置成為全國高校之首。

羅家倫校長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武力占據一個國家的領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從中共領導區艱苦的抗日鬥爭中，從國統區軍民抗日救亡運動中，都可看到這種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這也許就是本文開頭、羅家倫那句說得不清不楚的「有機體的民族文化」吧。苦難的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二十一世紀的曙光已在前頭，已經不再是睡獅、臥龍的中華民族，必將振興起來，昂首挺胸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朱一雄編東南大學校史研究）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調寄書。

褚律元：章太炎傳奇（119頁）

裘寶「羅家倫在中大」插圖（文見33頁）

①羅家倫（中）在中大校長任內，主持東南九大學運動會，左為郝更生。

②前排左二起：羅家倫、胡適、顧維鈞、程天放、李書華，前排左趙元任，後排左四葉公超，民國三十四年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大會時合影。

